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 (1899—1903 年)

傅 正

【摘 要】 1899—1903 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 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 1900 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 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 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关键词】 梁启超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民权 国权

【作者简介】 傅正，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B2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12 - 0043 - 18

严复晚年曾斥责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实为“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之罪魁祸首。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常有魔力，总能俘获人心，“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偶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严复对梁启超不满已极，竟痛骂道：“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①

将梁启超视为清王朝垮台的根源，诚不免誉之过甚，但说梁氏的宣传启发众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当属不争的事实。严复之所以对此耿耿于怀，还要溯及梁氏 1899—1903 年的特殊经历。这一时期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阶段，用他本人的话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自此居日本东

^① 严复：《与熊育锡·三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马勇、徐超、黄令坦编校：《严复全集》第 8 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1 页。

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①环境的改变仿佛为他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各种新学说、新理论扑面而来，令他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唯其如此，梁启超才会在这一时期骤变其说，时而“主暗杀”，时而“主破坏”。但也正因如此，梁氏才能一举奠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1903年以后，梁启超心思稍定，转而鼓吹保皇，反倒显得逐渐落后于时代激变的大潮了。

因其丰富性，1899—1903年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得到了学界的格外关注。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放弃革命立场？这些问题迄今仍然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一、“突变”还是“渐变”？

梁启超与革命派决裂始于1903年。为什么他会在这时“幡然悔悟”，重新致力于康有为的保皇大业？这一转变是突然发生的，还是早有征兆？对此，学界存在“突变说”和“渐变说”两种观点。

持“突变说”的代表人物是张朋园，他指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的任公与以后的任公，其言论几若判作两人；过去说要革命，以后则反对革命。随手拾起此后的言论，任何一篇一节，都可以看出他变了，变得是那样的迅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②其他学者未必如张朋园这样渲染梁氏转变的突然性或诡异性，但也常常以1903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思想判然分为两截，前此梁氏号召民主革命，后此梁氏醉心于国家主义。^③

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张灏强调尽管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以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但这归根到底并不完全代表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④换言之，梁启超思想早就包含了浓厚的国家主义成分，只不过在1903年以前，梁氏尚处在国权与民权两种思想的斗争当中，1903年以后，国权主张才彻底压

① 梁启超：《三十自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页。

②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7页。

③ 持类似主张的学者不在少数，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吴春梅、方之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88页；张衍前：《论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理论学刊》1996年第2期，第70~74页；方平：《论清末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34~35页。

④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倒了民权诉求。

随着学界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张灏的“渐变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例如法国学者巴斯蒂曾研究 1899 年《清议报》陆续刊载的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虽然她的主要目标只是考证梁启超从谁那里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但这似乎足以说明梁氏早就具备国家主义立场，而无须等到 1903 年以后。^①

综合上述两派观点不难看出，其实他们共享了同一个前提，即梁启超的思想存在民权与国权两极，1899—1903 年，他完成了从民权一极到国权一极的过渡。双方争议之处仅仅在于这个过渡是急剧完成的，还是渐进实现的。因此孙宏云便批评过去学者总习惯将卢梭和伯伦知理分别视为“民主”与“专制”的符号，“纠缠于梁启超的思想是从民主到专制、还是从专制到专制，抑或是从专制到民主再到专制的线性思维”。殊不知在梁氏的思维中，民权与国权根本就不是对立的两极，“他对于‘国’的认识以‘民’为核心，强调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国民，国民国家才是完全成立之国”。因此梁启超的国家论一以贯之，“始终以建立近代民族国民国家乃至将来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作为理想目标”，1903 年前后的区别是政府在近代民族国家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②

此说诚为不易之论！^③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国权与民权虽非对立之物，但不代表它们没有先后之别。先兴民权以促国权，还是先兴国权以促民权？民权与国权孰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1903 年以前的梁启超与 1903 年以后的梁启超显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更引人注目的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以前最熟悉的学说莫过于康有为的公羊学理论，然而仅仅两三年工夫，他“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尤其对康氏孔教主张很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④梁启超是怎

① 参见 [法] 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221～232 页。又，韩国学者李春馥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了梁氏笔下的卢梭《民约论》，指出梁氏从“卢梭信徒”到“伯伦知理信徒”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在 1903 年突然发生断裂。参见 [韩] 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46～60 页。

② 参见孙宏云：《清季梁启超的国家论及其相关理论背景》，郑大华主编：《近代思想史研究》第 10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7、101、113 页。

③ 梁启超强调民权与国权的同一性，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明，例如赖骏楠指出，梁启超从未把“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民权与国权在其学说中始终具有同一性。参见赖骏楠：《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03 年转型”为核心考察对象》，《清华法学》2016 年第 3 期，第 147～166 页。

④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6 页。

么一步步脱离其师之窠臼，走上理论自觉道路的？

又，郑匡民谈及梁氏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时指出：“日本的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吉利功利主义学派，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国家主义学派，均给了他极深刻的影响。”^①然而梁启超不可能同时重视上述几家观点，他对日本学者的取舍经过了哪些变化？

这些要点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职是之故，本文拟通过三条线索重新梳理1899—1903年梁启超思想的变化。第一，梁氏如何一步步脱离康有为的理论框架？第二，不同的外国思想家分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第三，梁氏对民权与国权的先后关系有过哪些不同的看法？

二、“新夷狄”说的烙印

讨论梁启超的思想学说，不能不先回顾康有为的今文学体系。康氏今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礼运》解《公羊》。按照康氏的说法，《礼运》关于小康的描述诚为上古三代的历史真实，但该篇所载之大同则是孔子托古改制的理想。大同之世并不存在于邈远的尧舜时代，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通过这种方式，康氏把大同、小康改造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两个阶段，并用它们分别比附公羊学的“升平世”“太平世”。

康有为强调，刘歆之罪在于他把小康之道捧为儒家正道，既使孔子大同之道隐而不彰，又使中国两千年来处处以上古三代为榜样，因而总免不了朝代更替、治乱循环。康氏为此疾呼：“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②孔子信徒当以大同理想为目标，不宜再尊奉上古三代小康之世，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引领中国走上进化之路。

康氏今文学体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哲学。中国和西方列强，谁更接近孔子的大同理想？如果说西方的社会发展程度高于中国，也更接近历史的大同目的，那西方岂不是“华夏”，中国岂不沦为“夷狄”？1897年，康氏弟子徐勤曾撰写《春秋中国夷狄辨》三卷，宣称孔子非但不严分“夷夏”，反而力破“夷夏”之界限。梁启超在给该书作序时便强调“中国亦新夷狄也”：“然则吾方日兢兢焉求免于《春秋》所谓‘夷狄’者之不暇，而安能

^①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5页。

^② 康有为：《礼运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3~554页。

夷人？而安能攘人哉？”^①

所谓“新夷狄”说构成了梁启超对中西关系的最初看法，它无疑只是种粗糙的历史哲学。该学说要在重新界定“夷夏之别”的标准，但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什么？什么才是文明进步的原因？“新夷狄”说没有给出解答。梁启超想要突破这种粗糙的历史目的论哲学，就必先摆脱康有为施加给他的束缚。孙中山等革命派为此提供了条件。

康梁师徒东渡避难之初，曾受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帮扶和庇护。^②也正是在日本人士的撮合下，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兴中会革命家频繁往来，并逐步心向革命。这一倾向当然遭到了康有为的喝止。例如，1898 年 12 月，梁启超等人在横滨创办发行《清议报》，表面上歌颂光绪皇帝，暗地里宣传革命。康有为知晓后，“遽命撕毁重印，且诫梁勿忘今上圣明”。^③

可以想见，只要康有为在，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交谊必然大受限制。不过，来自康氏的人身控制很快就被削弱，不久以后，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力，资助康氏 9000 元旅费，令他尽早离境。1899 年 3 月 22 日，康有为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④嗣后，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康门弟子与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兴中会革命派的联络越发密切，双方甚至讨论合并组党，拟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氏副之。^⑤

然而，梁启超在组织上逐渐独立于康有为，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在思想上摆脱康有为。例如 1899 年 6—7 月，梁氏发表文章《论支那宗教改革》，仍然奉行康氏“孔子改制”之说。文章指出：“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又称：“大同教派之大师，庄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师，荀子也。而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学，而大同之统殆绝之所由也。”^⑥可见他此时在理论上仍然步趋于康氏。

梁启超想要在思想上脱离“孔子改制”说和“新夷狄”说的窠臼，就需要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第一个人选是福泽谕吉。福泽在谈到《文明论概

① 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1 页。

② 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7~158 页。

③ 冯自由：《横滨清议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3 页。

④ 参见张启祯、〔加〕张启初编：《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先生年谱：1898—1913》，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4 页。

⑤ 参见冯自由：《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4~65 页。

⑥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 页。

略》的写作缘起时坦言：“美国人来到日本，此后日本又与西洋各国缔结了通邮、贸易等条约，我国人民才知道有西洋，互相比较，才知道彼此的文明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视听一时为之震动，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① 强大的西洋文明令日本人不禁心驰神往：“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②

这种对西洋文明的崇拜反过来使日本人滋生了对古老亚洲文明的蔑视，福泽直言不讳地表示，波斯、印度、暹罗、吕宋、爪哇等亚洲地区已经沦为西方殖民地，“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③ 日本想要摆脱被殖民、被消灭的命运，只有把自己的文明改造成真正的西洋文明。

这类观点在日本风靡一时。《文明论概略》问世不过几年，田口卯吉就自费出版了《日本开化小史》《支那开化小史》等著作，比较中日两国文明的不同性质。比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更加极端，田口甚至撰写《日本人种论》《破黄祸论》等文章，鼓吹“日本人种起源于雅利安”，与中国人、朝鲜人绝非同一人种。^④

通过上述介绍不难看出，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论不过是更为精细的“新夷狄”说。梁启超会在赴日后首先重视福泽谕吉，恐怕多半是因为福泽理论与他固有观念的相似性。例如，梁氏在1899年9月15日发表《文野三界之别》，开篇就宣称：“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⑤

对此，郑匡民评价道：“尽管梁启超当时还未跳出其师‘三世论’的窠臼，但在进化问题上，他与福泽谕吉几乎是一致的。”^⑥ 康有为的“大同小

① [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序言”，第1页。

② [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序言”，第2页。

③ [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6页。

④ 参见张昭军：《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75页；李凯航：《田口卯吉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及其批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6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385页。

⑤ 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⑥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8~79页。

康”说颠倒了中国、西方之间的“夷夏”关系，这确实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主张若合符节，梁启超也确实在这段时期频繁地附会康、福二氏的理论。

更鲜明的例子来自梁启超同月发表的《文明普及之法》。梁氏盛赞福泽谕吉乃“日本西学第一之先锋也”，他强调福泽谕吉的功绩在于开创“日本演说之风”，“风气既开，今日凡有集会，无不演说者矣。虽至数人相集燕饮，亦必有起演者，斯实助文明进化一大力也”。梁启超说这番话时，显然想到了一年以前的戊戌变法，以演说助力“文明进化”不就是维新志士广开学会的体现吗？否则梁氏不会接着宣称：“去年湖南之南学会，京师之保国会，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湖南风气骤进，实赖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废也。今日有志之士，仍当着力于是。”^①

可见，初到日本的梁启超，依然囿于戊戌变法的问题意识——在学说上追随孔子改制，在行动上号召开设学会。福泽谕吉尚不足以令梁启超走出旧框架。梁氏欲在思想上挣脱康有为之罗网，不仅需要外来的理论学说，而且这些外来学说还必须是康氏今文学体系不能解释的。

三、民族竞争意识

有别于公认的“1903 年转型”说，石川祯浩曾提出“1900 年转型”说。石川这样形容梁启超思想之变化——“他在流亡日本的初期曾对《文明论之概略》反复引用，而 1900 年以后却嘎然而止”，^② 因为梁氏所处的日本已不是福泽谕吉等人标榜“文明之精神”的时代，“而是早已经过了加藤弘之、陆羯南、德富苏峰等的‘社会进化论’、‘国民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论’的时代”。^③ 石川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到 1902 年，梁启超仍然多次在《新民说》中引用或谈论福泽谕吉。然而，石川的观点仍足以提醒人们：在梁启超这里，福泽谕吉、陆羯南、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人的学说存在竞争关系，并且在 1900 年以后，梁启超对陆羯南等人的重视程度确实可能超过福泽。

① 梁启超：《自由书·文明普及之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7 页。

② [日] 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日]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4 页。

③ [日] 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日]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5 页。

这里需要首先提到的是陆羯南、志贺重昂等日本“兴亚论”者。兴亚派虽然同样曾受巴克尔之文明史学的影响，但他们对文明论的理解明显不同于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等脱亚派。志贺重昂曾有过一个绝妙的比喻：某只乌鸦羡慕孔雀的美丽，遂取了一些孔雀羽毛插在身上，把自己装扮成孔雀的样子，想要混迹于孔雀的队伍。这种拙劣的模仿显然瞒不过真正的孔雀，因此这只乌鸦遭到了孔雀群体的驱逐，其他乌鸦也不再接纳它，终于孤苦而亡。^① 这里的乌鸦显然是在隐喻亟欲“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兴亚派看来，不管日本人再怎么模仿西洋文明，都不可能真正获得西方列强的接纳，与其在无用之“欧化”上穷尽力气，毋宁专注于振兴亚洲文明，使日本与中国、朝鲜共同进步。

1898年9月，梁启超流亡日本便受到过兴亚派的资助。他东渡未及一个月，就与志贺重昂有过笔谈，恳请志贺等人说服日本政府扶助光绪皇帝复权。^② 次年12月，梁氏亦撰文记录了他与陆羯南的谈话。陆羯南提醒梁启超，教育的目的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文明，他以日本大学教育为例，称表面上看，“摹仿文明，成效卓著”，究其内里，则“腐败有不可胜言者”。陆羯南接着评价道：“当局者一依德国主义，其所以为教者，则以服从政府为之精神也。遂使全国少年，缺独立自重之气，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书坑儒之术者，其祸更惨于秦政十倍乎！”^③

须知陆羯南一贯主张将“nationalism”翻译为“国民主义”，也更愿意从平民主义的角度诠释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④ 他对梁启超说出这番话，不仅是针对福泽谕吉等脱亚派，更是针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普鲁士精神”的狂热鼓吹者。在陆氏看来，彼时日本流行的“德国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伪国家主义”而已，真正的国家主义不是政府主义，而是国民主义。^⑤ 令陆羯南意想不到的，是梁启超听罢其说的反应竟是：

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

① 参见王俊英：《日本明治中期的国粹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8页。

② 参见《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6~468页。

③ 梁启超：《自由书·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④ 参见王明伟：《近代日本国民主义与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90页。

⑤ 参见王明伟：《梁启超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121页。

所以使人柔顺屈从也；乐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也……苟无精神，虽日手西书，口西法，其腐败天下，自速灭亡，或更有甚焉耳。^①

陆羯南本欲号召梁氏弘扬东洋文明固有之精神，梁氏却应之以孟德斯鸠、福泽谕吉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论调，诚可谓“牛头不对马嘴”。

可见，此时梁启超虽然与陆羯南等“兴亚论”者往来频繁，但他心目中更为推崇的则是福泽谕吉等脱亚派，以至于陆羯南等人希望通过兴民权以重振东洋文明，梁启超却抱怨中国文明阻碍民权之兴。

在这次谈话的三个月前，梁氏曾发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文章认为欧洲与中国有两大不同点。其一，欧洲列国竞争，因此其政府不得不励精图治，其人民不能不崇尚武德；中国则长期大一统，“其执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觉，不复知有世界大同”。其二，欧洲贵族与平民对立，“故官民相争之局屡起，民气日昌，民智日开，遂能打破积弊，一跃而登于太平仁寿之域”；中国一君万民，“故怨毒不深，而其争自存也不力……故桀骜愤激之徒，往往降心变节，工容媚，就绳墨，以求富贵，故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为此梁启超感叹：“呜呼！我中国民权之难兴即坐是故，可悲夫！”^②

这篇文章既称中国人“不复知有世界大同”，又称欧洲社会“一跃而登于太平仁寿之域”，岂不足以证明梁启超更推崇福泽谕吉？相较于陆羯南，福泽的优势在于他的观点更符合梁氏习惯的“大同小康”说和“新夷狄”说。

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梁启超有关加藤弘之的论说中。1899年10月25日，梁氏发表《论强权》，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有三阶段：其一，“人人皆无强权，故平等”；其二，“有有强权者，有无强权者，故不平等”；其三，“人人皆有强权，故复平等”。至第三阶段，“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③表面上，梁文“乃译述加藤弘之先生之余论而引伸之者也”；^④实际上，加藤的作用仍然是坐实康有为三世说的有效性。

然而，梁启超协调康有为今文学体系与外来理论资源的工作，越来越显

① 梁启超：《自由书·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② 参见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8~200页。

③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9~80页。

④ 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得力不从心了。设以欧洲进化的原因是国家竞争、阶级相斗，则欧洲列强岂不更近于小康之道，甚至更近乎法家秦制？此与孔子大同之道何干？又，设以中国历朝历代皆奉行小康之学，何以历朝历代皆无民族竞争意识？

康有为曾宣称，只要通晓孔子改制的道理，即“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①而今“孔子改制”说在解释民族竞争大势时却越来越难以为继了。这就好比旧瓶装新酒，新酒越满则旧瓶越不敷使用，直至新酒撑破旧瓶。

四、民权与大同的冲突

1901—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家的传记文章，主要改写自中江兆民1886年出版的《理学沿革史》，^②其中尤以受卢梭影响为大。郑匡民指出：“中江兆民的自由观是与其爱国主义情结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最困扰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与富强。”梁启超同样如此，“其最后的落脚点也与日本的民权运动一样，放在了‘向上以求民权，排外以伸国权之上’”。^③

早在1899年10月，梁启超就撰文《破坏主义》鼓吹“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民约之义诚然在欧美国家“既已功成而身退矣”，但将民约之义付诸实践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④

毫不夸张地说，在此后三年多时间里，梁启超对卢梭历史作用的论述，基本不出上述思路的范畴。只不过梁启超此时谈论《民约论》总忘不了提及大同或“太平世”，一面宣传卢梭的民族主义，另一面鼓吹孔子的大同之道，这种矛盾无疑折射出梁氏的身份纠结。1900年4月28日，梁氏致书孙中山，提议“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⑤大概推举

① 康有为：《桂学答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日〕狭间直树主讲：《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③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214页。

④ 梁启超：《自由书·破坏主义》，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⑤ 梁启超：《致孙中山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7页。

光绪皇帝当总统是梁启超能够想到的孙、康两派的最大公约数，倘若两派对此无法达成共识，合作的前景将十分渺茫。

同年6月29日，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前往新加坡拜访康有为，意欲撮合康、孙。怎料康氏竟向当地警察告发，致使宫崎等人下狱。^① 消息传出，日本志士大哗，纷纷谴责康有为是“无情汉”，“无复有倡孙、康合作之说者”。^② 更重要的是，此时日本外务省在清政府的抗议下，禁止东亚同文会继续资助中国异见人士。^③ 一则缺乏基本共识，再则失去了日本“民间”机构的中介，革命、改良两派至此彻底分道扬镳。

按照道理说，梁启超在调和两派无望之际，应该站在其师康有为一边，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大大影响了他的抉择：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与此同时，自立军起义失败，好友唐才常、林圭等人被杀；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梁启超对清政府的失望臻于极点，这使他一度心仪革命道路。在《辛丑条约》签订仅仅两个月后，梁启超就发表了《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学案》，其中特别指出，“国民之主权，不可让与者也”，又称“主权者，合于一而不可分者也”。^④

从总体上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学案》只不过是梁氏众多“学案”中平常的一篇，究其内容，卢梭却支配着梁启超对其他西方思想家的认识。例如在谈到霍布斯、洛克时，梁启超强调卢梭才是民约论的顶峰；^⑤ 在谈到边沁时，梁氏又强调其“多数人幸福原则”只是对卢梭民权学说的修正。^⑥ 但事实上，这些思想家原本相互对立，很难归于一派。至于论及康德时，梁氏更强调：“卢梭民约之真意，德国大儒康德（Immanuel

① 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7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258页。另据康有为给女儿康同薇的信中所述，告密者另有其人：“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极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见康有为：《与同薇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③ 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④ 梁启超：《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学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343页。

⑤ 参见梁启超：《霍布士（Hobbes）学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8~329页。

⑥ 参见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3页。

Kant) 解之最明。康氏曰: 民约之义, 非立国之实事, 而立国之理论也。”^① 卢梭之所以能统摄西方诸大儒, 是因为“《民约论》者, 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 法国大革命, 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② 卢梭既为 19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先驱, 任何体现彼时欧洲历史潮流的西方大儒的学说岂不都在卢梭的影响范围之内?

尽管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也会提及伯伦知理, 但伯氏更多地充当了卢梭的陪衬。纵然伯伦知理对卢梭多有诟病, 但梁氏每每将两者安排进互不妨碍的两个历史阶段, 以化解双方的矛盾: “卢氏立于十八世纪, 而为十九世纪之母; 伯氏立于十九世纪, 而为二十世纪之母。”^③ “十八世纪以前, 重干涉主义; 十八世纪后半, 十九世纪前半, 重放任主义; 近则复趋于干涉主义……卢梭, 放任主义之宗师也; 伯伦知理, 干涉主义之宗师也。”^④ 观其言论, 卢梭不像是伯伦知理的论敌, 他的主张倒像是实现伯氏主张的必要条件。

其实这种理解倒接近陆羯南的立场——国家主义之根本在于国民, 而不在政府。福泽谕吉、陆羯南两人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颠倒了, 1899 年时重福氏而轻陆氏, 1901—1902 年时则重陆氏而轻福氏。卢、伯二氏并重与陆羯南地位的上升, 这两个特征在梁启超 1901 年 10 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梁启超坦承这篇文章以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为框架, 名为介绍欧洲国家观念之变迁, 大半内容却在表彰卢梭的丰功伟绩。梁氏指出: “今日之欧美, 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 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⑤ 他所谓的“帝国主义”大体等于今人所说之封建王朝, 而“民族帝国主义”才是今人习称之帝国主义。

卢梭是民族主义的理论先驱, 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 法国大革命则标志着欧洲迎来了“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 “其《人权宣言书》曰: 凡以

① 梁启超:《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学案》,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338 页。1904 年 2 月, 梁启超在介绍康德政治理论时仍强调:“康氏之政治论, 殆与卢梭民约之旨全同, 而更以法学原理证之。”见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4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44 页。

②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467 页。

③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468 页。

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3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34 页。

⑤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324 页。

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① 法国大革命扫除了封建贵族统治，教育欧洲人民认识到国家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它证明了先有民权主义之发达，才有民族主义之兴旺。梁氏号召：“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由此看来，中国怎能不亟须一场自己的“法国大革命”？这场民族主义革命岂不恰与康有为的“大同”说相对立？

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发表的两个个月后，1901年12月21日，梁氏就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这样评述其师的大同之义：“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说，近者又专驰心于国家主义，久不复记忆，故遗忘十而八九。”^③ 是真忘记了，还是真不赞同？梁氏随后的言论庶几给出了答案。

1902年2—4月，梁启超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开篇即批判“天下主义”。据他的说法，过去欧洲人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④ 所幸后来欧洲民族主义日趋发达，才破除“天下主义”的迷障，“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⑤

另如《新民说》中有《论尚武》一篇，其文曰：“宗教家之言论，类皆偏于世界主义者也。”相比于其他宗教，儒教虽然“切近于人事”，“然孔子之作《春秋》，则务使诸夏夷狄远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礼运》之述圣言，则力言不独亲亲，不独子子，以渐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国界，以至仁博爱为宗旨”。^⑥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正是害了儒教之病，才导致爱国主义或民族意识薄弱。国人欲激发尚武民风，非破除有关“太平”“大同”之成见不可。梁氏名著《新史学》亦宣称：“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

①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4页。

②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③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8页。

④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2页。

⑤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1~712页。

⑥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7页。

已……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① 上述言论虽然没有点名，但针对何人，一眼便知！

1902年2月，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② 标志着他与康有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同年5月，梁氏索性去信康有为，辩称他批判“大同”说只是议论西方人的观点，绝无针对康氏之意：

大同之说，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法国之仙世门、喀谟德所言，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弟子言此，亦袭前人说耳。当下笔时，若几忘此论在中国之发自先生也者，其瞽其疏固可责，然谓其有意相攻则冤也。^③

上述言论看似自我辩解，实则暗藏讥讽。梁氏在信件末尾还不忘申明：“先生大同条理之书，弟子以为宜早日写定之，盖若更迟，则人将以为剿袭西学，殊不值也。”所有这些岂不都是在嘲笑康有为的“大同”说充其量不过承袭西人之谰言，几无可取之处？恐怕最令康有为感到愤怒的是，梁启超竟然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为依据教训康氏：“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④

梁启超至此已经持有了一种与康有为截然不同的历史哲学图式：康氏以“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为人类进化之三阶段；梁氏则以“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为人类进化之三阶段。在康有为看来，伸张民权是从小康向大同过渡时期的事情，此时中国尚不能小康，故应着力于振兴国权，先有国权而后有民权。但在梁启超看来，伸张民权是迈向民族主义的先决条件，唯有民族意识觉醒，方能振兴国权，故先有民权而后有国权。尽管师徒两人都承认，民权与国权绝非对立之物，双方却因民权、国权的先后次序不同，而各走一边、渐行渐远。

至1903年2月11日，梁启超仍然宣称“盖必先经民族主义时代，乃

① 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1页。

② 参见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6~684页。

③ 梁启超：《上康有为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9页。引文中的“德麻摩里”“仙世门”“喀谟德”，今译分别为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孔德。

④ 梁启超：《上康有为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199页。

能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①毫无向康有为妥协的意思。然而，他不会想到，仅仅几个月后，自己就将转变立场。

五、对伯伦知理的新诠释

梁启超摇唇鼓舌于“民权”“民族”令黄遵宪深感不安，他在1902年底去信告诫梁氏，时下中国风气未开，民众“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贸然授之以民约之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②怎料还不到一年工夫，黄氏之论就让梁启超感同身受。

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离日赴美，3月4日抵达加拿大温哥华，^③正式开始了他的北美之旅。这次游历让梁氏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所谓的民权政治，其结果不禁令他大失所望。美国社会腐败横行、贫富悬殊，当地华人帮派林立、内斗不已，所谓“民权国家”看来亦不过如此。更重要的是，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1903年，东京、上海等地又掀起拒俄运动。青年学生动辄以“自由”“人权”为名荒废学业、嬉戏取闹，这深深地刺激了梁启超。1903年8月19日，梁氏在给蒋智由的信中痛陈：“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他坦承自己立场已变：“惩新党焚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④

仅仅两个月后，梁启超就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以下简称《学说》），既重新诠释了卢梭与伯伦知理二人学说的不同之处，又重新定义了民权与国权的先后顺序。文章把卢梭的《民约论》比作药材，把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比作粟米。药材虽可以治病，但使用不当将致人中毒；粟米虽不能治病，却是人们存活下去的必需品。梁氏坦承过去他宣传民约之义本为治疗中国之病，不料旧病未除，中毒迹象“已隐现出没”，“噫！岂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⑤如此看来，振兴中华也不是非经过卢梭不可。

梁启超接着解释称，方今之中国与曾经之欧洲，“其受病根原，大有所

① 梁启超：《问答》，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页。

③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④ 梁启超：《致蒋观云》，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⑤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页。

异”，“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①过去梁氏主张先有民权而后有国权，现在却变为主张先有国权而后有民权。尽管理论依据不同，但他至少在国权与民权的先后次序上跟康有为达成了一致。

不到一年前，即1902年11月30日，梁启超在介绍加藤弘之的学说时，还不忘加上按语：“余夙爱读其书，顾不欲介绍其学说于中国，盖虑所益不足偿所损也。”^②言下之意，加藤之学固美，但不适合当下之中国。如今梁氏却唯恐加藤之学不能深入人心，加藤弘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倏然超越了陆羯南、中江兆民。

诚然，梁启超早在1899年就译介过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但陆羯南意义上的伯伦知理与加藤弘之意义上的伯伦知理毕竟不同。对照1899年的《国家论》和1903年的《学说》，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有趣的差别。比如在《国家论》中，伯伦知理对卢梭学说尚有肯定之处：

路骚之说，虽妄谬如是之甚，然间亦有合真理者。其言曰：国家不啻逼于民性不可已之势而成也。又曰：人类自由之意志，实占国家枢要之地，以立法行政。路骚此言，可谓砂中之金。^③

以今人通行之译名概括这段引文，即伯伦知理认为，卢梭指出现代国家主权的根基是人民公意，公意是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也不能被代表，它赋予一切立法行政以正当性，这无疑是正确的。此节在《学说》中完全消失了。

又如《学说》突出了伯氏对民族和国民的区分，梁启超对此专门解释道：

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而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虽然，今吾有一问题于此，曰：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此吾不能无疑之第一问题也。^④

“国民主义”是政治法律概念，指某一政府统治下的全体人民；“民族主义”

①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页。

② 梁启超：《加藤博士天则百话（一）》，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8页。

③ [德]伯伦知理：《国家论》，梁启超译，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页。

④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

则是种族概念，指同一血缘、语言和习俗凝聚成的特定族群。梁启超断断争辩“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意在强调当务之急是以清王朝为基础打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切不可妄行革命“排满”之举。这一内容则全然不见于《国家论》。

综上所述，1903年的梁启超确实在思想上发生了“突变”，只不过并非由民主主义者变为国家主义者，或由卢梭信徒变为伯伦知理信徒，而是改变了对国家主义的理解。前此梁氏主张民权为国权的前提，后此梁氏则主张国权为民权的前提；前此梁氏并不在意民族与国家的区别，后此梁氏则强调国家大于且高于民族。

六、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梁启超1899—1903年思想变化的轨迹。

首先，1899年前后，东渡日本之初的梁氏，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戊戌时期的思想烙印，彼时的梁启超仍以其师康有为的公羊学为自己历史理论的基础。按照这种学说，人类历史的进化图式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梁氏甚至以此提出了“新夷狄”说，即西方的文明程度比中国高，比中国更接近大同，因此西方才是“华夏”，中国反而是新“夷狄”。这种思想让梁氏一度十分推崇鼓吹“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换句话说，梁氏在1899年前后对福泽谕吉的吹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夷狄”说。

其次，大约从1900年开始，梁启超心中的民族竞争观念逐渐强烈起来。他意识到，欧洲近代的发达是民族国家竞争的结果，民族的竞争不只是政府的竞争、领袖的竞争，更是全体国民的竞争。中国想要跻身民族国家之林，必先树立民权意识，使人民意识到国家与民族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一种新的历史进化图式由此在梁启超的脑海中浮现，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这里的“帝国主义”指奥斯曼帝国、清帝国等传统王朝帝国，而民族帝国主义则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梁氏敏锐地看到，从传统王朝到近代帝国主义的必经中介是欧洲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转折点，卢梭作为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理论先驱，成为梁启超格外关注的对象。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梁启超开始热烈地宣传卢梭。这一切是其师康有为的公羊学体系无法涵盖的，反而更接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主张。

最后，即便是在梁启超鼓吹卢梭民约学说最为热烈的时候，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也始终萦绕其左右。伯伦知理使梁氏认识到，国家并非由人民约定产生的，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1903年以后，梁氏放弃革命道路，伯伦知

理迅速取代卢梭，成为梁氏最推崇的西方学者。此时梁氏放弃以振兴民权自下而上推动民族主义的道路，转而期待清政府通过改良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主义。

从“新夷狄”说到卢梭的民约学说，再到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这种思想变化轨迹使梁启超常常在保皇和革命两端反复游移。梁启超的思想纠结清楚地表现在其1902年11月—1903年9月连载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①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分别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黄君信奉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代表德国道路；李君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代表法国道路。只消玩味两位主人公的名字，就不难看出梁氏对卢、伯二氏的不同定位：李去病，意为去中国之病；黄克强，意为黄帝子孙自立自强。二者分别隐喻卢梭能去国人“爱国心弱”之病，伯伦知理能使中国自立自强——前者是良方猛药，专治疑难杂症；后者是肉食厚味，用以滋养身体。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评论道：“这篇小说完全是阐发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的，里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的辩论。”^②相关内容出现在小说第三回，黄、李二君往返辩论四十几轮，一个通宵下来尚不能尽兴，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梁启超后来坦承“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③黄、李辩论岂不就是“君宪”“革命”两条道路交战于梁氏胸中的最好写照吗？

毫不夸张地说，1899—1903年梁启超思想演变涉及的内容，几乎浓缩了后来革命、保皇两党辩论的主要论点。梁氏诚为清末保皇派的骨干，却对革命思想贡献甚多，无怪乎严复后来痛斥他“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然而，梁启超之所以令人着迷，恰在于他思想的丰富多样，恰在于他对近代中国多种彼此对立的思潮都有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参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稿本）》，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③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